

世界眼光与中国特色:作为历史学家的端木正*

黄肖昱

【提要】 端木正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留法归国后,他在院系调整中服从组织分配,转行教授世界史,是新中国“世界现代史”课程的主讲人之一。在被错划为“右派”后,端木正矢志不移,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翻译和世界史教材编撰,奠定了他作为中国世界史学科拓荒者的地位。在改革开放时代,端木正为创建法国史研究会和搭建法国史学术梯队鞠躬尽瘁。值此端木正百岁诞辰之际,本文希望从史学史层面回顾端木正的世界史研究之路,总结他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和法国史研究做出的贡献。

【关键词】 端木正 世界史 法国史 法国史研究会

端木正(1920—2006年),安徽安庆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中山大学历史系和法学系教授,曾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对世界史学界而言,他还有另外一重重要的身份,即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创始人。法国史研究是中国世界史学科比较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依靠沈炼之、王养冲、戚佑烈、张芝联等前辈学者的拓荒,如今的中国法国史研究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队伍,出版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上述法国史研究泰斗相比,我们似乎对与他们同时代的端木正在世界史学界的影响知之甚少。^①

一、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端木正 1951 年留法归国赴岭南大学政史系出任副教授兼代系主任,1952 年全国院系调整,岭南

*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二战敌后城市抵抗史比较研究——以里昂和上海为例”(项目编号:2019ELS011)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沈炼之、戚佑烈、王养冲、张芝联的史学研究论文,参见楼均信《我国法国史研究的老前辈沈炼之》,《世界历史》1993年第6期;楼均信《沈炼之和中法文化交流》,《杭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郑春生、周佳靓《论沈炼之的史学贡献》,《温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金佩林《戚佑烈先生的学术道路》,《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段启增《构筑文化交流桥梁,奠基世界史学研究——张芝联教授的世界史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王晴佳《张芝联先生与中外史学交流》,《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施展《张芝联教授著述系年初编》,《北大史学》2008年;张井梅《张芝联:中外史学交流的使者》,《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高毅《张芝联学术人生初探——写在先生百岁诞辰纪念之际》,《历史教学》2018年第4期;李宏图、许平《王养冲教授与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许平《高山仰止——写在王养冲先生100岁诞辰》,《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4期;李宏图《怀念王养冲先生》,《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等。对于端木正的研究,多为法学界人士和门生故交所撰的回忆文章,大部分收录进两本纪念文集。参见黄瑶、赵晓燕编《明德集——端木正教授八十五华诞祝寿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振民主编《鸿迹——纪念法学家端木正教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目前仅有两篇文章以编年史的方式梳理了端木正的学术履历,鲜有从史学史角度出发,总结作为历史学家的端木正对世界史教学研究贡献的论著问世。参见黄义祥《知名的法国史学家端木正教授》,载黄瑶、赵晓燕编《明德集——端木正教授八十五华诞祝寿文集》,第21—30页;赵晓雁、陆键东《端木正教授年表》,载王振民主编《鸿迹——纪念法学家端木正教授》,第264—282页。此外,对新中国第一代法国史学人的研究成果当推乐启良的《政治、人生与学术:第一代中国法国史学人的群像研究》,但该文对端木正的学术思想着墨不多。参见乐启良《政治、人生与学术:第一代中国法国史学人的群像研究》,《历史教学问题》2020年第2期。

大学并入中山大学,端木正遂转入中大政法系教书,1953年政法系被撤销后,端木正再转入历史系工作。对端木正而言,尽管非史学科班出身,但他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曾跟随杨人榘学习法国大革命史;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期间,参与过张奚若的“西洋政治思想史”课程;在法国留学期间,著名的国际关系史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的“法国对外政策史”也是博士必修课。^①而且,他之前从事的政治学和国际法学工作也需要以历史学为基础来开展研究,加之他能熟练运用英、法、俄三门外语,于是便负责世界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科研工作。^②这一转换工作岗位就是27年,直至1980年他才重拾法学系的教鞭。

端木正是新中国第一批“世界现代史”课程的主讲人和奠基人,改革开放后他又积极倡导成立法国史研究会,对推进我国世界史学科和法国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贡献良多。可以说,端木正的一生参与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科从规律探寻到知识型世界史再向研究型世界史迈进的历程。^③于沛先生曾多次呼吁加强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史学史研究,从史学史层面探讨中国世界史学者的学术成果。^④本文试图结合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史,回顾端木正的学术生涯,总结他留给世界史学人的学术遗产。

二、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端木正的世界史研究之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 从转入历史系到错划“右派”之前,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探索如何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讲授“世界现代史”课程,此谓“规律探寻”阶段;2. 从错划“右派”到“文革”结束时期,因政治环境的变化,端木正无奈之下只能选择通过翻译和参编世界史教材的方式,向大专院校学生和人民群众普及世界历史知识,此谓“填补空白”阶段;3. 改革开放后,端木正积极倡导和搭建学术共同体,推动我国法国史研究向专门化发展,此谓跨入“研究型世界史”阶段。总体而言,端木正的学术生涯见证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历程。

就世界史教学和研究而言,端木正不仅是中山大学“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奠基人和主讲人之一,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在大学课堂上讲授“世界近现代史”的史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无愧是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拓荒者。尽管民国时期的大学历史系已有学者开设“西洋史”“西洋史学史”等涉及西方历史文化的课程,但只是作为知识的补充,并无开展世界史研究的条件。^⑤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大学历史系开设“世界通史”课程,但是该如何讲授这一门新课,只有苏联的模板可供教师们参考借鉴,于是大学教学中出现了对苏联教材的“现学现卖”和“照本宣科”,甚至出现“仅有苏联提纲,搜罗教本,补增注释”和“课本提纲俱无,揣度苏联有关课目内容,比照自编”的现象。^⑥

端木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白手起家,开始编写教案讲义,摸索着如何为学生讲好“世界近现代

① 端木正《法国史研究文选·自序》,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③ 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认为中国世界史研究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规律探寻、知识型世界史再到研究型世界史三个发展模式。参见朱孝远《研究型世界史的要素和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推动我国世界史研究从知识型向研究型迈进》,《光明日报》2016年11月19日第11版;《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构建:路径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1期。

④ 参见于沛《加强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史学史研究》,《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7日第7版;《为中国世界史学科修史刍议》,《世界历史》2013年第3期。

⑤ 马克垚《70年砥砺前行:中国世界史学科》,《历史研究》2019年第4期。

⑥ 端木正《世界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山大学周报》1954年12月4日。

史”这门重要的基础课。^①但对于在国内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前景,端木正起初却持怀疑态度,他坦言:

首先是史料的缺乏,其次是语文工具的不足。世界史的原始资料我国收藏的几乎没有,甚至翻译的也少得可怜。这是解放前半殖民学术界的必然现象。其次我们自己的外国语文训练太差,勉强能以两三种外国文看书,而世界史的范围如其广,工具总感不够。至于外国历史上的死文字懂得就更少了……研究中国史得出一点成绩,可能被译成俄文,受到苏联和世界学术界的重视。研究世界史想要赶上“国际标准”似乎今生无望,跟着人家后面学习,还很吃力,谈不上研究和贡献。因此,不少很有条件研究世界史并且曾经作过一些功夫的人,都放弃世界史专攻中国史了。前辈如此,后生就对世界史更望而生畏。这就是国内各大学世界史教员甚感缺乏,世界史科学研究开展困难的原因之一……我虽然认识到安心从事世界史教学工作的必要,但是对于科学研究的可能迟迟不敢相信。我决心服从人民需要,从事世界史教学工作,可是我抱着“自我牺牲”的精神,放弃科学研究的前途。让教中国史的发挥他们独到的见解,也许一举成名;而我教世界史只能作鹦鹉学舌,为了人民利益,甘心作“无名英雄”。^②

端木正认为苦于史料的缺乏和语言工具的不足,国内世界史学者只能是承担授课任务,无法像中国史同行一样,做到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可能。诚然,就50年代初的新中国大学历史系的学术环境而言,教授和研究世界史是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思考后,端木正改变了之前的悲观情绪,反思道“如果强调困难,不仅阻碍我们自身进步,教学的改革,并且会影响新生的培养,使同学和助教视世界史没有前途,则世界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后果不堪设想。”而“从无到有,从有到好,应是我们从事世界史科学研究的信条”。^③

与此同时,端木正也在思考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使命。他认为,世界史学者的研究应该为国家提供历史经验。端木正举例,以往学界对“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研究已十分充分,但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出发,继续研究上述课题依然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他以为这是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价值所在。^④在之后改革开放时代的“八二宪法”修订之际,端木正便曾呼吁中国法国史学者亟需加强对大革命以来法国各部宪法的历史渊源研究,为我国宪法的修订提供历史经验。^⑤

除学术研究外,端木正认为世界史学者应该承担起向人民群众普及世界文化知识的重任。他认为“把历史上大事件大人物,以数万字篇幅,通俗的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尤其是翻译和引进外国的经典史学著作更是世界史学者的责任。纵观端木正的学术生涯,他运用掌握英、法、俄三门外语的优势,独自或参编的译著就达九部之多。

综上所述可知,当时刚转型至世界史领域不久的端木正对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定位和发展方向有着非常清晰的思考。他认为,在学术定位上,世界史学科应为我国的各方面建设提供来自世界各国

① 笔者目前发现端木正先生最早编写的提纲是1953年春季学期的“近代世界史教学提纲”,可知他刚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便立马着手编写教纲和讲义。

② 端木正《世界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山大学周报》1954年12月4日。

③ 端木正《世界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山大学周报》1954年12月4日。

④ 端木正《世界史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体会》,《中山大学周报》1954年12月4日。

⑤ 端木正《法国大革命和宪法》,载《端木正自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的历史经验教训;在社会实践上,世界史学者应承担起为人民群众传播世界文化知识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端木正深知在学习和借鉴他国优秀史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时,应以我为主,勿囫囵吞枣、食洋不化。

作为中山大学世界近现代史教研组的负责人,端木正出席了1956年高教部组织召开的综合大学文史教学大纲的审订会。他同南开大学杨生茂、北京大学王立、复旦大学靳文翰等新中国第一批“世界近现代史”课程的讲授者们一道,负责审订《世界史教学大纲》现代史部分的草案。^①端木正和其他学者均认同,虽然各大学在教授“世界通史”内容时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但为保证世界体系的完整性,需坚持世界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亚洲史、中国史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②

他也将这一理念贯彻在他的教学中,尽管课堂上使用的教材是从苏联引进的,但他并不亦步亦趋地照搬苏联教材的讲法。如在“1870年至1918年的世界历史”的导论中,端木正便有意地引入同时期的中国历史做横向比较,涉及“巴黎公社”时,也增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的内容,力图让学生有一个中西比较的视野,能从宏观层面理解世界历史体系。^③

探寻和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首先需要思考的问题,便是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这背后涉及的是史学实践者的历史观、价值观,更是史学家在开展历史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无法回避和绕开的话题。在国内外学术交流尚未中断的1956年,中西方史学家就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讨论。^④注意到这一学术动态的端木正便在《世界现代史分期问题》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当时苏联学界和我国学界对世界现代史、苏联史、中国现代史和国际关系史的分期标准。^⑤中国史学界在引进苏联的学术体系的同时接受了苏联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观,苏联的历史书写以阶级斗争为纲,确信全世界各地区皆遵循共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逐一更替。^⑥但端木正体现了自己作为中国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和方法论自觉,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苏联模式的世界史分期做了一些修正。例如,端木正认为不能简单地将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作为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套用到每个国家的国别史上去。^⑦此外,端木正有感于治中国史的学者缺乏从世界史角度思考中国史的问题意识,强调现代中国也应是现代世界的一部分,对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不应脱离世界现代史的分析框架。^⑧

综上可知,端木正没有放弃对整体史观的探寻和追求,否认世界史仅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更反对将中国史抽离出世界史研究。此外,在平日的工作中,端木正也时常向同在中大任教的陈寅恪、刘节等中国史研究的前辈请教问学。^⑨

在从事世界史教学和研究的同时,端木正深知在学科起步阶段若“没有大量历史资料文献翻译过来,就很难实现学术上的独立自主”。^⑩于是,他开始承担国外经典史学作品和原始史料的翻译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订《世界史教学大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14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审订《世界史教学大纲》,第1页。

③ 端木正《世界近代史的教学大纲》,1955年,未刊稿。

④ 参见陈怀宇《国际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以1956年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讨论为中心》,《文史哲》2017年第1期。

⑤ 端木正《世界现代史的分期》,《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⑥ 钱乘旦《以现代化为主题构建世界近现代史新的学科体系》,《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

⑦ 端木正《世界现代史的分期》,《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⑧ 端木正《世界现代史的分期》,《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

⑨ 郑欣《忆陈寅恪师》,《文史哲》1996年第6期;刘节《刘节日记1939—1977》上册,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318页。

⑩ 端木正《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3页。

进工作,这既是他以为的中国世界史学者的责任,更是当时身处紧张政治环境下所做的无奈之举。^①

早在1956年端木正就从法文原著译出了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索布尔的经典著作《法国革命,1789—1799》一书,并在有限的条件下不断跟进索布尔的研究。^②1957年端木正被错划“右派”,直至1961年才重回讲坛,在此期间,他和中大世界史教研组同事们合作编译《世界近代史资料参考选辑》,以配合“世界通史”课程的教学工作。^③该史料汇编的体例以政治革命为主线,强调阶级斗争,选译了欧美近代史上的农民战争和工人运动史料。该书可以视作端木正这一代世界史学人在原始史料的积累上迈出的第一步,书中所选译的史料基本为一手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且编写组有意识地从英法俄三语种文献中加以选取,相互参照补充。端木正在这当中承担了许多法国史文献的翻译工作。

由周一良和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四卷本教材于1962年出版,此外还推出了一系列配套的世界史资料汇编。其中,世界近代史的资料编撰工作交由中山大学负责,端木正便这样参与了《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的编译工作,并和主编蒋相泽一起统稿校对全书。^④之后由于“文革”的来临,正处于学术发展黄金期的端木正只能再次委身至干校的牛棚里,待政治形势稍有好转后与中大世界史教研室的同事们合作编写《世界简史》一书。^⑤

1977年,经张芝联教授推荐,端木正承接了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一书的翻译工作。^⑥该书引入我国后被拆分成两卷,上卷由河北师大外语系从英译本译出,下卷由端木正组织几位懂法语的年轻学者根据法文原著译出,他本人则校对了全书,且添加了许多有价值的译注。^⑦此译本一经出版多次重印,成为中国世界史学者研究拿破仑和法国大革命史的经典读物。

端木正在政治环境紧张的形势下,尽管有时无法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解惑,但仍孜孜不倦地通过翻译原始史料和参编教材来为起步阶段的新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些点滴的努力奠定了他作为世界史学科拓荒者的地位。

三、但开风气,不为人师

改革开放时代的端木正已步入花甲之年,他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推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1. 积极参与法国史研究会的组织和学术合作工作,培养世界史,尤其是法国史方向的后继人才;2. 通过撰写文章、书评、编撰工具书等方式介绍国内外史学界关于法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国史研究,甚至也无人自称是法国史专家。^⑧

“文革”阻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学界鲜少有创见的史学论著出版,即使有也残留不少“影射史

① 端木正先生曾言自己“主观方面是写作的热情不高,宁可从事翻译,不愿轻言写作。那个时候一有政治运动,只要发表过什么,就准会上大字报,断章取义,无限上纲。1957—1958年,1966—1968年,被贴的大字报不可谓之不多,但没有一张涉及译作,我曾私自庆幸,翻译毕竟比写作安全得多”。参见端木正《法国史研究文选·自序》,第II页。

② 索布尔《法国革命,1789—1799》,端木正译,王德辉校,三联书店1956年版。

③ 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组编《世界近代史资料参考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

④ 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⑤ 中山大学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编《世界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⑥ 周颖如《为他人做嫁衣:译稿编辑生涯三十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24页。

⑦ 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中山大学《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端木正校,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⑧ 沈坚《中国法国史研究四十年:日益专门化》,《社会科学报》2019年2月28日第5版。

学”的痕迹,端木正对此是忧心忡忡。^①也许有感于此,改革开放之初端木正就同沈炼之、王养冲、张芝联、戚佑烈等有欧美求学经历的世界史学者们一道,在上海筹备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并于1979年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一次年会。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世界史学术社团,为促进世界史学科对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端木正当选为研究会的首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他在成立大会上做了《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的报告,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运用翔实的一手文献,全面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书写,分析不同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与大革命思潮之间存在的张力。^②此文所展现出的“中国视角”和“中法交流互动”主张颇有为研究会的学术使命定下基调之意。此时的端木正意识到我国世界史学界从人才储备到研究视角都与国际学术界存在不小的差距,亟需加强国内外学术合作和培养后继人才。

就学术合作而言,1979年4月张芝联教授出访欧洲前邀请端木正北上代课,端木正在北大做了有关法国史研究的系列报告,涉及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法国宪法等专题。^③最值得一提的是1981年8月,应法国史学会的邀请,法国大革命史家索布尔教授来华短期讲学,这是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从法国请来的第一位重量级学者。因为译书的缘故,端木正可谓是对索布尔学术思想最为熟悉的中国学者,他全程参与了学术讨论,并在索氏讲学结束后,与张芝联合作发表《阿尔贝·索布尔对法国革命史研究的贡献》一文,让国内史学界能及时了解索布尔的最新学术动态。^④经过端木正和法国史研究会同仁的推介,索布尔似乎成为国内世界史学者最耳熟能详的法国大革命史家。^⑤此外,直到1983年端木正才有机会重访法国,赴巴黎二大讲学,并于同年在《历史研究》发文介绍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动态。^⑥

就搭建学术梯队而言,端木正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开招法国史方向的研究生,开设“法国大革命史”和“法国现代史”课程,并多次为法国史研究会组织的世界近现代史讲习班授课,力图加快对后继人才的培养。^⑦他在中山大学招收的法国史研究生骆幼玲、张家展成为他后来主编《法国大革命词典》时的得力助手。他推荐后来成长为中美关系史专家的梁碧莹参加中国美国史研究会。^⑧在有条件时,他鼓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端木美前往瑞士留学,很有远见地提醒她留意以欧洲中立国的视角观察世界历史。^⑨此外,端木正同多位法国史学家保持密切联系,比如他与著名汉学家巴斯蒂(Marianne Bastid)夫人保持着终生的友谊,巴斯蒂夫人也时常利用中法学术交流的机会帮端木正收集法国的最新研究资料。^⑩

端木正的另一个重要学术贡献便是编撰史学工具书。为纪念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端木正在刘宗绪、楼均信、陈崇武等中生代学者的协助下,组织法国史研究会老中青三代学者三十余人共同编写

① 端木正《评〈拿破仑〉》,《世界历史》1978年第1期。

② 参见端木正《法国革命史的研究在中国》,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编《法国史论文集》,第15—46页。

③ 根据笔者对端木美研究员的口述访谈,时间:2019年9月3日。

④ 参见张芝联、端木正《阿尔贝·索布尔对法国革命史研究的贡献》,《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

⑤ 张芝联《我与法兰西》,《世界历史》1996年第4期。

⑥ 参见端木正《富有年鉴学派特色的〈旧制度法国历史词典〉》,《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⑦ 申晨星《在端木先生身边的日子》,黄瑶、赵晓燕编《明德集——端木正教授八十五华诞祝寿文集》,第31页。

⑧ 梁碧莹《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页。

⑨ 根据笔者对端木美研究员的口述访谈,时间:2019年9月3日。

⑩ 巴斯蒂、马骥《法国近代中国研究的巨擘——巴斯蒂院士访谈录》,《国际汉学》2014年第1期。

了《法国大革命史词典》,并担任主编。^①它不仅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工具书,更是我国世界史学界出版的第一部外国专门史词典,代表着当时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的整体研究水平,甫一出版,便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②该书共收词条634条,附录法文索引和大事年表,凡25万余字,300余页。作为一部工具书,它除了对法国大革命中风起云涌的各政治派别和重大历史事件给予简明扼要的客观评价,还清晰地梳理了当时英法美德俄各国的法国大革命史学流派、史家脉络和学术成果,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收录了部分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内颇有建树的中国学者,如杨人楩、沈炼之、王养冲、张芝联等词条,对他们所做出的学术贡献给予充分肯定。此外,端木正还与吴于廑、林志纯、齐世荣、郭圣铭、廖学盛等世界史名家联合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词条。在法学和法国史两个专业均有建树的端木正负责“法国宪法”“巴贝夫”“白里安”等词条的编写工作。^③可见此时我国的世界史学者已经不满足于知识型世界史的探索模式,需要更多囊括国际史学界研究动态的工具书,方便下一步进行专题式的深入研究。

在法国史研究会这一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逐步走向正轨后,更多的法国专题史研究著作问世。端木正积极为学术同仁们撰写书评,推广优秀学术成果。他尤其关注新生代的学者们在法国专题史的论著中是如何处理和把握中法文化交流史和中法关系史的问题。^④经过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实践,端木正对宏观世界史体系的感悟颇有心得,他强调中国视角应是我国世界史学者需要坚持的特色。^⑤

端木正先生从1953年改行教授世界史,至2006年遽归道山,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他与新中国第一代的其他世界史学人一道,身体力行地推动世界史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深入发展的历程。作为新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教学和研究中体现出强烈的现实关照性,具有将中国史融入世界史编纂体系的方法论自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他联合其他世界史同仁共同倡导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推动法国史研究向专门化深入发展,逐步培养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国史研究团队。端木正先生勤勉工作的一生,可谓是中国世界史学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最好写照,自然也得到了国际文化界的认可,1986年出版的《法语国家名人录》便有他的专属词条,细数他在中国法国史研究和中法文化交流中的贡献。^⑥

(作者黄肖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邮编:200241)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参见端木正主编《法国革命史词典》,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通过检索中国知网可发现《法国大革命史词典》出版仅一年内,就有五篇关于该词典的书评发表,参见承文《〈法国大革命史词典〉出版》,《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林有能《〈法国大革命史词典〉出版》,《学术研究》1989年第5期;张家展《介绍〈法国大革命史词典〉》,《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日叁《介绍〈法国大革命史词典〉问世》,《史学集刊》1989年第4期;夏保成《评〈法国大革命史词典〉》,《史学集刊》1990年第1期。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外国历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版。

④ 端木正撰写的书评多为中法关系史和中法文化交流史的学术成果,参见端木正《读刘述先著〈马尔劳与中国〉》,《法国研究》1985年第3期《评价〈巴黎公社与中国〉》,《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喜读新出的法国史专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⑤ 端木正《喜读新出的法国史专著——〈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世界历史》1996年第6期。

⑥ Cercle Richelieu de Paris, *Annuaire biographique de la francophonie: réunissant trois mille biographies abrégées de personnalités francophones du monde entier*, Paris, 1986, p. 193.

wester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for its brilliant view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nalyze how Otto of Freising reframed the entire history of mankind with two historical lines, the City of God and the City of earth, and then brought the sense of process back to the universal chronicles. Otto of Freising reflected the unitary world chronology of western Christendom from the temporal perspective. Spatially, he further elaborated on the theory of *translatio imperii*. He attempted to search for origins of the investiture controversy through history. He was not intended to invent new theories, but to objectively rescue the deconstructed sense of time for Clio since *The City of God* by Augustine. *The Two Cities* is an example indicating how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was in need of a more complicated narrative on past and history in the high middle ages, and furthered the development of medieval historiography.

The Achievements and Dilemmas in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Academia // Xu Shanwei

The writing of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in line with global view of history has started since World War II, and gradually reached prosperity after the 1990s. The article selects four representative and influential textbooks for a brief analysis, pointing out the unique aspects of their theories and methods, such as the historical view transcending national and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in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the theory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comparison, etc. However, there remain som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writing world history and global history, of which the most prominent one is the overemphasis on the role of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resulting in a lack of attention to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 within various civilizational systems and its impact. That leads to the imbalanc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root of this problem is also caused by Western scholars' deviation in the adoption and appl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ies.

Both as Foundation and Method—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 Xiang Yannan

As a reflective discipline, historiography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Yet its significance, as a matter of fact, is often not valued by some historians. One may appreciate the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historiography and historical theory is a secondary discipline under history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setting regula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which is a recognition of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history. Secondly, from the theor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epistemology), future generations can only know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through historiography. Objective history cannot be repeated, and historical text as a substitute for real history serves as the intermediary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of knowledge. Therefore, to a certain degree, all history has the nature of historiography, which is also th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oundational role of historiography in the history discipline. Thirdly, due to the specificity of historical knowledg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historiography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text on which objective facts are based. Consequently, historiography is not only a refl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discipline but also a significant research method. To establish a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iography will further the pursuit of truth.

World Perspectives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uanmu Zheng as a Historian // Huang Xiaoyu

Professor Duanmu Zheng is a famous Chinese legal scholar and historian. After his return from France, he followed the order and switched to teaching world history during the restructuring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He then became a pioneer who lectured on courses on "modern world history" in China. Although he was mistakenly classified as a "Rightist" in the political campaigns, he did not give up on translating classical works and writing academic textbooks on world history. These effort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inese discipline of world history.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era, Duanmu Zheng has devoted himself to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Society o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and cultivated a scholarly team of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 To celebrate his one-hundredth birthda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trace Prof. Duanmu Zheng's scholarly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historiography, and conclude his contributions to World History Studies and French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